



國學大師
叢書

趙樣初題



GUOXUEDASHI

郭沫若評傳

國學大師叢書

郭沫若評傳

謝保成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郭沫若评传

作 者:谢保成

特约审稿:周自强

特约编辑:毛军英

责任编辑:钱 宏

封面设计:彭开天 赵焜森

封面肖像木刻:颜 仲

版式设计:王玲云 芝 公

责任印制:罗时彪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6.875 插页:0 字数:17 万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7-80579-553-3/K·16

定价:13.50 元(精)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学大师丛书》

总序

张岱年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基，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轂,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覿,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

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互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四十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翼翼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一九九二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国学大师丛书》

重写近代 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 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癖、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 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

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九十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以“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 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即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路。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九十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

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 宏 (执笔)

一九九一年阳春节初稿

一九九二年立春节修定

序

林甘泉

在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曾经以郭沫若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超越”为题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郭沫若早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对他的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强调，“郭沫若既继承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他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传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判断。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我与黄烈同志主编的《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一书，正是以上述认识对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作出系统评述的。

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如果从学术思想、学术文化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就是“国学”的同义语。郭沫若作为一个“时代之骄子”，在“国学”的诸多领域差不多都有着“大师”级的成就和贡献，而且又往往是以多学科融汇、立体交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以往对郭沫若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学术研究的某个领域，如甲骨文、金文、古代史等等，这样做对于考察郭沫若在这些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虽然可以比较深入、细致，但研究视野不免也受到一定的局

限,这对于了解郭沫若在中国近现代国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个性特征是很不够的。集郭沫若“国学”研究即学术成就于一书,展现其大师的风采,恰恰可以弥补欠缺,将郭沫若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上。

郭沫若是一个政治、学问兼而为之的人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多的人心目中,郭沫若的学术形象几乎被其政治形象所掩盖。赞扬他的人,称道他的历史研究。反对他的人,则指责他的一些著作未能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其实,郭沫若固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国故”,我们也不必讳言他的某些论著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失误。但就郭沫若毕生的学术活动而言,他作为一位国学大师是完全当之无愧的。且不说郭沫若有大量与政治并无关系的国学研究成果,其学术价值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一部著作来说,它所开创的国学研究的新途径也是值得肯定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实事求是地还郭沫若一个“国学大师”的真实面貌,不论对认识郭沫若其人,还是认识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都是非常必要的。

近代国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汲取西方近代科学的成果。郭沫若在国学研究领域取得的若干具有开拓性的成就,同样也是以吸收外来文化为条件的。跳出“国学”范围,才能认清“国学”真相,郭沫若的这一名言,既归纳了他本人的研究历程,又概括出他自身的治学特色。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于如何借鉴外来文化,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谢保成同志涉足郭沫若研究已有十余年的历史。围绕郭沫若的学术道路、学术特点,他曾经发表过一系列论文。在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前后,我读到了他与叶桂生合写的《郭沫若的史学生涯》一书,以及《史剧与史学关系的探索》、《从20年代学术文化发展趋势,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论述,都有独到的研究心得。这本《评传》不但可以说是他对自己先前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提炼和升华,还可以认为是在认识和研究郭沫若“继承

传统,超越传统”方面迈出的新的一步。

《评传》没有单单就“国学”论国学,而是从20年代国学研究基本状况入手,引出郭沫若吞吐中西的文化观。以此为出发点,揭示出郭沫若的“国学”观和所确立起来的“国学”新体系。这一总体性的考察,既展现了郭沫若国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又与整个时代学术发展扣在一起,使人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郭沫若在领导学术潮流方面的杰出贡献。

在分方面评述郭沫若的学术成就时,作者似乎有意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进行论列。先是郭沫若对《易》、《诗》、《书》等的考察,由“经”入“史”。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阡奥”。再回过头来,以实物证史,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纵论诸子学术,显然是以“史”转论于“子”。“诗词曲赋”属古典文学的范畴,但在四部中却归于“集”。郭沫若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不仅令人瞩目,还颇具特色。《评传》的这一总体构思,既符合郭沫若整个学术研究的实际,又有助于人们认识其“国学大师”的真实形象,足见作者用心之良苦。

还应提到,《评传》十分注意郭沫若治学的研究思路、心理历程和学术风格。书中对郭沫若考释青铜器铭思路的揭示,关于考察周秦诸子历程的追踪,以及评李说杜的心理分析等等,都能启人认识、开阔思路。最后两章,更是作者着力发掘的贯穿郭沫若全部学术生涯的风格和特点,这样的研究是不多见的。

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能够在原有基础上再填补自己研究的“空白”,固然不易。倘若能够深涉卜辞和彝铭,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新收获。莫说写这本《评传》是自己研究的总结,应当说这是新起点。让我借用郭沫若的一名句,以为共勉:

只愿攀登莫问高!

1994年7月12日

PRÉCIS

(英文提要)

THIS SERIES OF BOOKS ON GREAT MASTERS OF STUDIES OF THE QUINTE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s chiefly inspired by the idea that "each generation has its own learning", and the here of this biography, Guo Mo-ruo (Ding Tang), is just such a "Favored one of the time" who can best incarnate this saying. Despite the "roughness and carelessness" in some of his writings, and the "frequent changes" of his points, to exclude him, or to write off this influence will leave an evident missing link and a blank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ing. It is on the basis of this objective reality that this book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meandering progress and the pros and cons,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studies of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reflected in Guo Mo-ruo's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attainments during the whole length of his life time when china advanced from one endeavour to e-